

# 從美國總統大選看美中矛盾的本質

◎張文基

牌，最近也發生了一系列負面的動作。

1. 美國聯邦檢察官九月三日宣佈，紐約州州長的前副幕僚長孫雯與丈夫胡曉因涉嫌擔任中國代理人，違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與洗錢簽證詐欺等罪名被捕，兩人對指控均表示不認罪。當然，事實的真相必須在法庭上決定，然而，過去幾年的許多例子充分顯示聯邦檢察部門辦案的優先性，和時間往往受聯邦政府的政治考量影響，在這個時候決定高調公開這個案件，很難說沒有政治因素。

2. 就在同一天，華盛頓郵報三日以“中國鎮壓手段如何深入美國城市”為標題，how China extended its repression into an American city. 針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十一月訪問美國加州三藩市，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期間出現的藏獨人士與歡迎習近平群眾發生的小規模衝突事件，企圖引導讀者相信中共是如何透過恐嚇和監視來跨國打壓異議人士。

文中公開點名洛杉磯大陸僑團的僑領鹿強組織二十輛巴士，定四百個旅館房間，安排八百人到APEC會場歡迎習近平。文中並強調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在其中的作用。華盛頓郵報是一個自由派，親民主黨的媒體，該報宣稱這個調查歷時六個月，但是在事件發生十個月後才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公佈，難道沒有它的政治目的？

3. 9月13日拜登政府鎖定了對中國進口商品的大幅關稅上調，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許多關稅，包括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100%的關稅，對太陽能電池徵收50%的關稅，以及對鋼鐵、鋁、電動汽車電池和關鍵礦物徵收25%的關稅，將於9月27日生效。這一行動引起了業界的抱怨，稱這一增長將擾亂包括半導體密集型產品在內的供應鏈，對阻止中國的技術轉讓和行業主導行為幾乎沒有作用。

4. 美國國會在六週夏季休會期之後於9月9日復會，在復會的第一

週，眾議院把許多與抗衡中國有關的立法一起送交全體議員表決。截至星期四（9月12日），包括臺灣、香港和電動汽車在內的共28項涉及中國的法案在眾議院通過。議案內容橫跨香港、臺灣、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無人機、電動車電池製造和中國人購買美國農地等眾多領域。也包括支持臺灣全面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對來自中、俄等國公民購買美國農地進行國安審查、撤銷香港駐美經貿辦特權、禁止國土安全部資助孔子學院等一系列法案。誠然這些法案距離最終變成政策還有很長的路，他們的迅速通過就是一個政治表態，然而，這也反映出今天美國精英階級對中國的普遍敵視態度。

以上的事實清晰的暴露出美國精英階級的窘境：

1. 他們發動對中國的全面壓迫，但是絕對避免會導致全面攤牌的軍事衝突。

2. 他們盡量避免一般選民討論對中國的具體政策，也許害怕民眾瞭解衝突的本質，而只讓受金融寡頭控制的精英們，如議員、官員、智庫來草擬各種“反中、防中”政策和法案。問題是你可愚弄民眾一時，不可能永久！

美國大選展示美國的嚴重分裂

最近川普和賀錦麗的辯論會充分顯示了兩人的根本不同：對美國現狀的完全不同的認識、應對的思想和政策取向的不同，這也反映出今天美國人民的嚴重分裂。

川普重複的強調美國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而衰落的原因是幾十年錯誤的思想和政策，特別是全球化的左翼思想，犧牲了美國原有住民的利益。他認為拜登的國際政策會將世界帶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應該少管國際事務，回歸傳統的孤立的國家主義，透過關稅壁壘來重建美國的製造業。他反對許多因應氣候變化的能源和汽車政策，強調加強邊境管控阻止非法越境的外國移民。在社會問題上他主張回歸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強調個人責任，反對政府過度介入，需要管控婦女墮胎，反對為LGBT（同性戀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ca.rr.com](mailto:uschinaforum@ca.rr.com)

中倫壇社 主編  
社務委員: 張紹濤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盛嘉麟 范湘濤 張文基 社長

刊頭設計 劉學武  
每星期六出刊  
第582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所創造的特殊政策。

賀錦麗在這些問題上正好相反，她雖然認識到美國面對的許多問題，但是在思想上仍然延續幾十年來美國大政府自由主義的主張：希望透過增加社會福利改善下層人民的生活，包括非法移民。希望透過聯邦政策扶持創業。希望提供足夠軍費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這些願景是美好的，問題是幾十年來它們一再破滅，而在今天美國政府面臨嚴重財政赤字和龐大國債的現實下，這些承諾很可能就是靠吞噬海洛因來取得的短暫自我感覺良好！

美國的根本問題和美中矛盾的本質：

其實美國人民不論黨派最關心的現實問題是相當一致的：1. 生活越來不容易，對未來沒有信心，特別是對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和社會安全退休金，Social Security，會不會破產的不確定性，而這些又源自於加速擴大的聯邦赤字和積累的國債。

2. 通貨膨脹、貧富不均。  
3. 治安環境越來越差。  
4. 保護邊境免受非法越境者的入侵，及非法移民者佔用了有限的資源。  
5. 不斷發起對外戰爭。  
6. 合法墮胎權...

這些問題的深層根源就是過去六十年國際金融寡頭集團透過金錢控制了美式民主的機器：國會、深層政府、法院、媒體。他們已經背叛了美國開國時的憲法精神，成為了為特定階層服務的工具。所以，美國人民有深沉的無力感。

就以問題的核心，美國飆升的國債為例。1989年還是老布什當總統時，控制政府赤字就是白宮和國會

最關心的事，當時的美國國債是2.57萬億美元。經過35年的努力後，2023年美國的國債是33.17萬億，而年度赤字是1.7萬億，年度聯邦總預算6.134萬億，其中可自由支配開支是1.7萬億，包括國防支出0.805萬億。換句話就是2023年支撐美國政府運作的錢全靠借貸的。請問這能持續嗎？

在這一段時間美國從無可爭辯的超強，變成今天的渾身是病，實體經濟衰退，然而，股票市場卻屢創新高：1989年底，S&P 500指數是353.40，Nasdaq是417，2024年9月19日，S&P是5713.64，Nasdaq是18,013.98。35年間分別漲了15.17倍和37.25倍，而美國的中產階級扣除通貨膨脹率的實際收入幾乎沒有增長！這就是美國的問題！

美國今天的病根是自從尼克森把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美國在自由主義經濟的口號下，用金融經濟取代了自19世紀以來實行的政府政策引領下的實業經濟制度，這個制度奠定了美國19世紀末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基礎。

而在同一段時間內，中國大陸卻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採取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依靠政府的長期規劃和引領下充分發揮民間積極性的，以發展實業經濟為主的經濟政策，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發展奇蹟。

這種發展觀的不同和因而延伸的制度的不同才是今天中國和美國精英階級的根本矛盾。但是，這不是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間的矛盾！當美國人民拋棄了過去幾十年的錯誤發展觀和政策後，美中關係才能會有根本的變化，這個日子並不會遙遠！

# 中國擴大內需的可行性方案

◎劉世錦演講重點

求增長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個點或區間，到了這個點和區間以後增長速度就開始下降。2010年1季度實際上就是歷史需求出現峰值的點。

第二個是需求結構，需求結構背後是收入結構。簡單地說，中等收入群體或者中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分佈結構，有兩種：一種是中高收入者人數比較少，低收入者比重多；另外一種結構是中高收入群體比重相對比較大，而低收入群體比重相對比較小，這種結構一般稱之為“橄欖型”結構。

歷史需求峰值決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轉捩點，而需求結構決定了轉捩點後中速增長的持續多長時間。

在轉捩點之前，整個經濟增長主要的約束條件是「供給不足」，容易出現“通脹”問題。轉捩點出現以後，主要約束成為“需求不足”，就成為主要的矛盾了。

從國際經驗看，中速增長保持較長時間的經濟體，一般基尼係數比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對較小，有一個規模較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樣的中等收入群體可以釋放較大規模、較長時間的需求，從而支撐較長時間的中速增長。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較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較小，當這個群體需求潛力大體釋放後，容易出現增長的明顯減速，導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滯後退的困境。

中國目前的情況是，中等收入群體大體佔1/3, 4億人左右。在這之下，還有9億多低收入群體佔2/3。中國的基尼係數多年來是在0.4以上，有一些研究認為在0.45或者是更高的水準上。

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性的意見：“目前需求不足和中等收入群體相對比較小，低收入群體比重比較大的這種需求結構直接有關”。

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

增加有效消費需求需要把消費區

分為「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

包括低收入階層在內，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費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趨於穩定，或者說，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消費總量擴大體現為結構升級。消費增長更多由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發展型消費拉動。

這兩種消費實現的方式差異比較大，生存型消費以個體消費為主，發展型消費比較多是採取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方式，如醫保社保採取互助供給方式，學校教育是集體學習方式，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準直接掛鉤。擴大發展型消費僅靠個人努力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搭樑子、建制度、出資金，是政府消費支出與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準滯後，直接拖累發展型消費的增長。現階段，城市居民抱怨或憂慮較多的是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的壓力。近三億農民工、近兩億外出進城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欠賬更為突出。四億中高收入群體與九億低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相當大部分源於基本公共服務分享水準的差距。所以擴大消費要找准痛點：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託的發展型消費，二是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

針對中國宏觀經濟現在總需求不足的狀況，宏觀政策上，特別是財政政策上應該有一些比較大的舉措：經濟刺激計劃規模。以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為主籌措資金，在一到兩年時間內，形成不低於10萬億的經濟刺激規模。2008年搞了四萬億刺激計劃，當時的經濟總量是30多萬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去年GDP總量達126萬億，可以考慮按GDP總量10%的比重，確定刺激計劃的規模。

以往是物質資本投資，這次是人力資本投資，發展型消費也是人力

資本的投資。比如，醫療衛生解決的是人的健康問題，教育解決的是提升智力水準、知識水準，社保解決的是免除人民的後顧之憂，增加流動性，這些都是在提升人力資本，這也就是“人力資本概念”。

兩大突破口，或者說兩個重點領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準。短期重點是由政府收購購銷的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農民由進城打工轉為在城市家庭團聚、安居樂業。增加保障房供應可以擴大房地產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帶動裝修、傢俱、家電等消費，家庭團聚可以帶動教育醫療養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後顧之憂，降低預防性儲蓄。

第二個重點是加快都市圈範圍內中小城鎮建設，帶動中國的第二輪城市化浪潮。城市群、都市圈範圍內的核心城市通常佔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鎮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可容納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農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時也適合製造業和中低端服務業的集聚。在這個範圍內，房地產、基建等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重點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金等要素雙向自主流動，以市場化為基礎優化配置利用各類資源，農民可以進城，城市居民可以下鄉，給城鄉居民雙向創業就業置業以更大空間。進一步解放思想，積極探索，把農村宅基地流轉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相配套，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現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社保能力增強、城鄉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產業穩定增長和結構升級，一舉數得。

另外還有一個目標：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由現階段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口增長到8-9億，

這個目標實現以後中國經濟中速增長長期能延長比較長的時間，這對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有基礎性的意義。

解決卡脖子問題

目前應該更多地關注高生產率的產業。最近幾年國家提“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指標就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提升生產率可以是從價值鏈的低端、中端向高端的提升，也就是傳統產業的升級。此外，直接切入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增長的新賽道，這是最近幾年發展的重點，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

在這段時間內中國具有三大優勢。

第一個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全球範圍內14億人構成一個市場，只有中國能夠產生“統一市場”。“統一市場”形成以後，消費規模擴大，市場能容納更多的同類型企業，中國國內競爭即可逐步成長出一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事實上中國國內這些企業之所以有競爭力是因為中國國內有一系列優勢，包括超大規模優勢，它能夠捲起來，而很多國家是卷不起來的。

第二個優勢是後發優勢加新技術應用。

中國有較大的追趕潛能，或者說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所形成的結構性潛能，也是發達經濟體已經做過的、我們還沒有做但有條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從目前的人均1.4萬美元到3.5-4萬美元，至少還有2萬美元的追趕潛能，主要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服務業發展，製造業和農業的穩固與升級等。

第三，強大的跟隨技術和工程化能力。中國的短板是“0-1”基礎研究領域比較差。“卡脖子”是一個表像，背後是中國在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或者源頭創新方面較弱勢。

對此有三個解決方案，一是認可和保護弘揚企業家精神，二是重視發揮大型科技企業的作用，中國在基礎研究領域要加強和國際上的交流，最後應該壯大科技人才。

編者按：中國經濟面臨嚴峻的轉型挑戰，引發世人關注，2024年9月24日，投中資訊在成都以“壯大耐心資本，培育新質產業”為主題的論壇活動中，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詳細闡述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現狀、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和解決卡脖子問題的方案。以下是根據演講實錄的重點。

從供給約束到需求約束

近兩年來，中國宏觀經濟面臨日益增大的總需求水準下降壓力，GDP平均指數已經連續7個季度處於負增長。8月份的數據表明，消費、就業、財政等重要指標都出現明顯放緩乃至收縮的跡象。

所以現在需要關注兩個問題：一個是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很多問題，包括消費、就業、財政等等。總需求不足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都經歷過類似增長。這種增長快速吸收了人類工業化階段的技術成果，把先行者幾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長濃縮到二三十年時間內，也稱為擠壓式增長。但這類增長是有終點的。

2010年1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在達到一個高點後開始減速，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速。一個可比較的對象是日本經濟。日本在上世紀50和60年代曾經經歷了9%左右的高速增長。70年代初進入中速增長，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減速為低速增長，2%左右，還出現了零增長和負增長。如果與日本比較，中國目前處在中速增長的後期，應該還有5-10年的中速增長，增速應在4-5%之間。

理解這一過程，需要理解兩個概念。

一個是歷史需求峰值。工業化城市化幾十年到上百年的進程中，需